历代名帝政治智慧丛书

主编　杨　群

康熙皇帝的治国谋略

威名扬四方

裴海燕　著

华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是生长于中华大地的人们所创造的，同时又极大地影响着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它的短长自有其内在的根据，此所谓有其利必有其弊，但人们又总是希望去其弊，存其利，即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由此引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不断的论争、探讨（也许从“中国传统文化”初创之时，这一现象即已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不断论争、探讨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变型的），尤其是到近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从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直到80年代的“文化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始终是关注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的“兴奋点”。

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作肯定与否定的回答是不容易的，也是不科学的。就其形成与发展来说，它有其合理性；就其具体的内容来说，则又是糟粕与精华并存。进一步说，所谓“糟粕与精

华”，也是站在今天的立场而言的，是用今天的标准加以衡量而得出的结论。而对其加以衡量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为今所用，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推动文化持续向前发展。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组织了“历代名帝政治智慧”这样一套丛书，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治国者政治智慧这部分具体内容加以“去粗取精”，为今所用，给今天的施政者提供一个借鉴，一个参考。我们认为，选取少数治国者（封建帝王），对其治国安邦成败得失进行探讨，并不是否认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从来没有否定过少数英雄人物或当政者的作用。事实上，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正是通过少数英雄人物或当政者在历史上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对于探究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来说，追踪少数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探讨其治国安邦的谋略及其成败得失，无疑是很重要的。同时，对前人成败得失的探讨，继承吸收前人成功的经验，去除纠正前人失败的错误，对于今天的施政者而言，无疑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本丛书不是一套治国安邦者的个人传记丛书，它的着重点在论述、探讨治国安邦者的施政得失上，

并分析、探讨其原因，反映治国安邦者施政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根由。对于有关的时代背景及具体的施政情况、施政者本人的有关情况等，则不作为叙述的重点，只是在涉及有关问题时加以简单介绍。

参加本丛书撰稿的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均在相关的人物研究上各有建树。在开始写作前，就写作中的有关问题，诸如历史背景的把握，治国共性与个性的处理，对其成败得失分析、把握的原则等，华夏出版社的林建初先生、王进先生等又与作者们进行了多次讨论，充分发表意见，逐步形成共识。因此，这套丛书又可说是融进了大家的心血，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至于我个人，在本丛书的策划、运作过程中，只是做了一点组织协调的工作。

是为序。

杨　群

1999年11月20日

引　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康熙帝名爱新觉罗·玄烨，为清代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个皇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具有雄才大略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是顺治皇帝福临的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地点是景仁宫。他的母亲佟氏出身于汉军镶黄旗，只是顺治皇帝众多妃子中的一个，地位低下，康熙当上皇帝后，才母因子贵而被尊封为孝康皇后，改佟氏族姓为佟佳氏，并入满洲旗籍。

康熙出生后不久，即因没有出天花等原因而被皇父顺治下令抱出宫外养育。因为天花在当时是一种令人畏惧、传染力极强的疾病。当时由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负责照看，住在西华门外稍北的一座府第（即今福佑寺）。但康熙两岁时仍染上了致命的天花，多亏孙氏的精心照料才逐渐康复，他的脸上从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几颗稀疏的麻点。

出过天花的康熙随后被召进宫中，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由于严格的宫廷教育和康熙本人的聪明好学，使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基本掌握了满族传统的国语和骑射，以及汉文四书五经中那些讲究君臣之礼和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在亲往悯忠寺参加亲信太监吴良辅削发出家仪式后返宫途中一病不起。在

发觉自己已染上致命天花病的情况下，顺治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问题。在满洲亲贵和皇太后参加的御前会议上，福临曾有意在他的兄弟辈中挑选一人来继承皇帝位，因为当时满族并没有一个父死子继的确定制度，不存在违制问题。况且，他的几个儿子年岁都太小，年龄稍长的皇二子福全又才智平庸，不足以担当重任。在此情况下，具有政治远见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几位亲王力主由皇子嗣位，博尔济吉特氏还指名皇三子玄烨为候选人，理由很简单，他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将来可不致为此影响大清帝国的基业。顺治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但为了避免他自己即位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专权独断的局面，他临终前和博尔济吉特氏一起特地制定了一套防范措施：废除皇室宗亲长辈代行摄政的做法，实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成员的四大臣辅政体制，规定：凡涉及军国大事，四大臣议定后，必须奏请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裁决而行。因而在康熙即位的头几年中，朝廷政务主要由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辅政大臣主持，博尔济吉特氏则负责教养小皇帝，并参与重大决策。

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十四岁。因为他的父亲福临从14岁开始亲政，所以辅政大臣索尼等人先后上疏，请求玄烨援例而行。玄烨便在祖母博尔济

吉特氏的支持下，于同年九月初九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诏告天下，开始亲政。

亲政之初的康熙帝，面临着诸多问题：四大臣辅政体制发生了不少变化，四大臣之一的鳌拜势力膨胀，他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严重阻碍着皇权的行使；四大臣辅政时期顽固推行落后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剃发易服、圈地、投充法的实行，大大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凋敝的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以吴三桂为首的藩镇势力急剧扩张，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台湾郑氏反清势力不断骚扰福建沿海等地，严重威胁着清王朝在当地的统治。与之同时，边疆问题也亟待解决：在东北，沙俄势力不断侵入我国境内，杀烧奸淫，无恶不作，严重影响着我国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在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噶尔丹分裂势力的活动猖獗，不断骚扰和入侵喀尔喀蒙古部落，大有与清廷分庭抗礼之势；清廷在青藏地区的统治也急需加强……所有这一切，都直接考验着康熙帝的统治能力。

事实表明，康熙在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时，也充分展示出他遇事沉着果断、目光深远的特点，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证明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

因而，当他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在皇位之争的烦恼中去世时，他完全可以为自己一生奋斗

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宽慰，因为他已为空前绝后的“康乾盛世”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目　录

引言 1

乾纲必独揽 1

□四大臣体制的演变　□智除鳌拜　□御门听政

满汉本一家 17

□废除民族歧视政策　□崇儒尊孔　□设立南书房

□特开博学鸿儒科　□尊重汉俗

制人必先发 37

□“三藩”势力急剧膨胀　□锐意撤藩　□镇定部署　□剿抚并用　□谨慎善后

海波不再惊 57

□抚招受挫　□进剿台湾　□设官分守　□晨界开海

外患务必除 79

□设立“新满洲”和“布特哈八旗”　□中俄最初交涉　□永戍黑龙江　□较量雅克萨　□签约尼布楚

大漠风尘定 97

□喀尔喀蒙古内附　□狼烟起边垂　□多伦会盟

□转战大漠　□绥服远略

藏里凯歌回 123
□尊崇达赖喇嘛 □维护宗喀巴道法 □真假达赖喇嘛之争 □出兵西藏

经国先安民 141
□“奏销案”的启示 □鼓励垦荒 □蠲免钱粮 □完善赋税征收环节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赈济灾荒 □惜财节俭

政治吏治先 177
□“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 □亲察兼密奏 □慎用言官 □奖励清官

治河是国务 197
□“河患之深，日甚一日” □起用靳辅 □“海口”之争 □靳辅复出 □亲理河工

满洲为根本 223
□削弱诸王特权 □旗民合编保甲 □关注八旗生计 □完善八旗军事镇压网

治国须读书 251
□推崇程朱理学 □编定群书 □考订史乘 □关注科学技术 □对西方文化的利用与限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大臣体制的演变

智除鳌拜

御门听政

乾纲必独揽

韬光晦迹，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常用的政治谋略之一。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自己的锋芒收藏起来，把踪迹隐藏起来，等待最佳时机到来后趁机而动。《旧唐书·宣宗纪》就记载说，唐宣宗李忱为光王时做梦都想当皇帝，但却把自己的野心深藏不露，“愈事韬晦”，最终如愿以偿。康熙亲政初年为顺利除掉专横跋扈的权臣鳌拜，也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谋略，被清人昭槤称为“声色不动而除巨慝”（《啸亭杂录·圣祖拿鳌拜》）。

□四大臣体制的演变

康熙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时还是个八岁的孩子，顺治皇帝为避免自己当年即位后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专权跋扈的局面，特在临终前制定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废除由皇室宗亲长辈代行摄政的做法，改由在异姓功臣中选出数人共同辅佐年幼的皇帝。因为这些辅政大臣的地位以及他们与皇帝的关系，都无法与摄政宗室相比，容易驾驭，又可使他们相互牵制，从而避免权臣专擅的局面。

但是，辅政大臣毕竟具有代行皇权的部分权力，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必然会造成一种凌驾于百官之上的权势，因而其仍有擅权专断的可能，更何况

四大臣各自势力也在发展变化，共同辅政的体制自然也会随之改变。

当时顺治之所以选择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并非偶然。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皆出身满族世家，且为太宗旧部，很早就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倍受宠信。太宗去世后他们曾因极力拥立皇子福临即帝位而得罪多尔衮，遭到打击，直到顺治八年福临亲政后才官复原职。索尼晋爵一等伯，升内大臣，总管内务府；鳌拜晋二等公，任议政大臣，升领侍卫内大臣；遏必隆则与兄并袭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苏克萨哈虽原系多尔衮属下近侍，但他能在多尔衮死后首举其“诸逆状”，因而受到顺治帝和皇太后的信任，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正白旗直属皇帝后，苏克萨哈以功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他们不仅参与议论军国大事，而且与顺治、皇太后交往颇密。史书记载说，太后有事总喜欢通过索尼、鳌拜、遏必隆告知皇帝；太后有病时也总由他们“近侍卫护”，因而受到顺治的嘉奖。

在辅政的最初几年，四大臣都能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办事，故而相安无事。但很快就出现了不安定因素。

主要原因出在鳌拜的居功自傲、骄横跋扈上。

他是清初开国勋臣费英东的侄子，骁勇善战，从一般的巴牙喇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赐号巴图鲁，为后起诸将的佼佼者。这也是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在另外三位辅政大臣中，他独不敢与索尼相争，因为索尼系四朝元老，从一等侍卫累升至内大臣、一等伯，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遏必隆系开国勋臣额亦都之子，位至公爵，且与鳌拜同属一旗，但权力欲不强，遇事随声附合，故二人亦无龃龉。令鳌拜最为不满的是苏克萨哈，他爵位虽低，只是个一等男加一云骑尉，却班次竟在遏必隆、鳌拜之前，且有可能代替年老的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因此鳌拜时时借机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并竭力拉拢与自己同属镶黄旗的遏必隆，使之为己所用。

康熙五年（1666年）初，鳌拜为了拉拢两黄旗，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时达到孤立、打击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人的目的，蓄意制造了一场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圈地的事端。早在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之初，他为抬举自己的地位，便将自己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将幼弟多尔衮三兄弟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从此种下矛盾的基因。

顺治初年圈占北京附近土地给八旗官员时，本应按左右翼顺序分配，两黄应优先分配，但多尔衮已为摄政王，便优先将永平府一带镶黄旗应得之地

给了自己的正白旗，而将保定、河间等地正白旗应得土地分给了镶黄旗，从而使两旗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但时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两旗间因分拨土地引起的不愉快已渐渐忘却。而鳌拜却重提旧事，要求两旗进行更换。此事立即遭到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等人的坚决反对。但鳌拜坚持己见，于三月称旨支持镶黄旗圈换土地，移回左翼之首，同时立即圈拨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四县地给镶黄旗，造成已经迁回左翼之既成事实。

恰在这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要求停止圈地，指出此举系鳌拜背主所搞违法活动，而且已给旗民带来严重危害并遭到坚决抵制，停止圈地势在必行。以苏纳海为首的户部本不同意圈换土地，至此决定撤回差去换地的官员。鳌拜闻讯恼羞成怒，他假传圣旨，令吏兵二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捉交刑部议处，其他抗命官员也分别议处。年仅十三岁的康熙坚决不同意重处苏纳海等人。而鳌拜等人则依仗他们在辅政大臣中的优势，诬称苏纳海三人结党抗旨，违背祖制，矫旨将苏纳海等人“著即处绞”，随后强行圈换土地。

此次圈换土地，共骚扰近京十多州县，造成失业者达数十万人之多，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也从反面教育了年幼的康熙帝，使他对权臣阻

碍皇权行使的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独立思考问题，并对鳌拜有所戒备。

□智除鳌拜

圈地一事的发生，也使朝内百官惴惴不安，因而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愈来愈高。康熙六年六月首辅索尼去世后，鳌拜更为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康熙便以“辅政臣屡行陈奏”为由，经皇太后同意，于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宣示天下开始亲理政事。

鳌拜本想借索尼去世之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之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不料想皇帝准备亲理政务，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但他又不愿归政，拉苏克萨哈和他一起干预朝政，试图以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来压制康熙帝。而苏克萨哈一向鄙视鳌拜所行，非常愿意归政于帝，故断然拒绝了鳌拜的要求，鳌拜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

康熙尽管已明示天下开始亲理政务，但辅政领导内三院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体制并未立即改变，辅臣朝班位次仍在亲王之上，并继续掌握批理章疏大权。而且鳌拜的党羽已经形成，势力强大。仅分据军政要职的就有：鳌拜的弟弟镶黄旗满洲都统穆里玛、内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